

“乡野” 与 “庙堂” 之间

——社会变迁中的
乡村教师

洲
著

“乡野” 与 “庙堂” 之间

——社会变迁中的 乡村教师

张济洲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野”与“庙堂”之间：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教师/张济洲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8

ISBN 978 - 7 - 5161 - 2778 - 0

I . ①乡… II . ①张… III . ①农村学校—中小学—教师—研究
IV . ①G635. 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616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沂纹

责任编辑 张报婕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216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在农村教育改革日益深入的同时，乡村教师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既有的研究多从感性层面描述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及现实诉求，但是忽视从历时性叙述框架和共时性分析视角探讨国家、社会和学校互动关系中乡村教师角色演变中的冲突和困惑，以及乡村教师复杂的生存状态。

张济洲的博士后出站报告选择乡村教师这一边缘文化群体作为研究主题，从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纬视角探讨乡村教师文化流变、身份错位以及与乡村社区的文化互动及诸种权力纠葛。这一研究主题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价值，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该书揭示新旧教育嬗变过程中乡村教师文化困惑。

古代乡村教师即为塾师，多为科举落第的下层文人。游离于庙堂之外，扎根于乡野的乡间塾师承担农家子弟初级文化启蒙职能。一些通达乡土人情的塾师，适合百姓的日常需要，融入乡间，在村民中赢得信任和尊重。塾师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与地方权力的代表——绅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乡村生活公共责任，扮演乡村文化礼俗活动的主导者的角色。近代以降，晚清逐步实现了由“科举化社会”向“学校化社会”的转向，随之新教育兴起，塾师阶层在中国教育舞台逐渐退却，乡村文化权力和结构也面临重组与蜕变。推行近代国民义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社会的过程，于此背景，乡村塾师被迫开始艰难转型。

新旧之际，乡村塾师与新式教师竞争一直是民国乡村教育舞台无法回避的现实。然而，政府主导的新式教育与乡村生活格格不入，新式教师并不受乡村欢迎，在与乡村塾师竞争中完全落败。历史如此令人吊

2 “乡野”与“庙堂”之间

诡，政府和知识精英提倡白话文和“新教育”欲以向乡村普及文明，但是反过来白话文和新教育却造成知识分子与乡村生活疏远。史料显示，近代实施“新教育”较之清前期，农民识字率有所下降。

二、该书从国家—社会框架揭示乡村教师疏远乡村及边缘化困境。

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是理解 20 世纪乡村教育变迁的重要参照系。“皇权止于县政”、“天高皇帝远”，古代乡村社会维系无为而治，处于官与民中介的绅士群体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基本上不举办乡村教育，私塾则由家族或家庭承担，在这种框架下，乡村教育处于自治状态。

但是清末民初是我国由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时期，现代学校制度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向乡村延伸，但政府在农村推行新式教育过程中，却遭遇扎根于传统社会土壤中的私塾的阻抗，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冲突，地方性对现代性的反抗，展示现代化进程中的丰富多彩。伴随国家政权的下沉，乡村教育逐步纳入到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体系之中，乡村教育与地方社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新式教育在课程、教法、师资等方面与乡土社会产生种种不适应和冲突，乡村教师逐渐游离地方社区之外，成为一种特殊群体。

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政府不断打击、取缔私塾教师，到 80 年代以来国家整顿民办教师、清退代课教师，可以看出国家的力量在乡村教育中不断延伸，乡村教育的师资结构在整个 20 世纪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私塾教师“亦耕亦读”、现代意义上的民办教师“亦耕亦教”、当代意义上的乡村教师队伍的国家公职化，乡村教师角色的演变充分反映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乡村教师的“乡土”色彩逐渐淡化，“国家身份”渐为浓厚。

在政府与乡村社区两极之间，教师的重心完全偏向了一端，教师受制于政府管理，成为国家的“公家人”，却逐渐失去了“乡土性”。陶行知先生对乡村教师的“去乡土性”提出严肃批评，他反对“洋教育”以及“洋教师”给农村教育带来的破坏，提倡乡村教师与乡村生活息息相连，陶行知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致力于培养真正深入农村生活，和农民打成一片的乡村教师，从而使乡村学校成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

乡村教师作为深处我国农村的知识分子，是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必

须依靠的文化力量，但是却缺乏与乡村社区的相应互动。伴随教师专业主义甚嚣尘上和师范教育体制一味追求高、大、全，教师管理领域科层化日益严重，考核评比、职称评审等束缚乡村教师，乡村教师仅仅停留在专业人员角色，追求体制内激励，疏远了乡村生活，从农民“自己人”转变为村落生活“陌生人”。

事实上，农村教师只有扎根乡村，形成对农村文化的体认、认同和尊重，才能为农村社会服务，农村教师不仅应该具有娴熟的专业技能，更应该拥有一颗火热的“乡土心”。

三、该书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研究结论较为新颖，具有创新性。

当前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断下移，从关注宏观转向为微观，从精英文化走向日常生活。教育史研究视野也正在转变，近年来兴起的民间教化研究、社会教育研究以及边缘群体的教育史研究，表明教育史学研究领域的新的拓展。

张济洲博士后研究报告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乡村教师发展史，将人类学田野研究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其优点在于通过叙事方式从社区内部、从底层民众中发现历史，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可以摆脱研究者的中心意识，获得一种研究的真实和现场感。该书对百年来不同阶段乡村教师发展的原始材料进行系统收集，特别对过去较为忽视的乡村民间教育家资料和地方档案资料进行梳理，

该研究具有明显创新性，选择乡村教师作为研究“三农”问题和农村教育的主要突破口，从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去探索乡村社区、地方政府与教师之间的复杂关系。20世纪以来乡村文化权力发生急剧嬗变，各种不同政治力量伸向乡村，名目繁多的乡村建设和实验，并没有挽救乡村的衰落，反而新教育改革与乡村日益疏离，乡村教师身份的国家建构与乡土生活产生冲突与矛盾。本书试图通过教师个人的生活叙事，从而将宏大的历史变迁置于鲜活的生命场景中去，展示乡村社会、文化与国家力量冲突与竞争的生动场面，使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乡村教师在新农村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存在的缺陷。

20世纪乡村社会转型，与古代乡村知识分子相比，乡村教师道统符号意义衰落，其地位和威望一落千丈，这也是造成乡村教育衰败的重要原因。本书作者对乡村教师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历史演变的简单梳理，

4 “乡野”与“庙堂”之间

而是从学理层面深入探讨乡村教师地位下降及其边缘化的社会成因。应该看到，国家和政府一直努力提高乡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和学历层次，特别是“以县为主”的农村教育财政体制普遍实施，乡村教师工薪水平稳定提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乡村教师地位日益边缘化的处境，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薪酬递升和学历层次提升加深了乡村教师与农村社区疏远。

该书认为，乡村教师并不是一个同质群体，国家权力直接介入乡村教育，乡村教师分化为不同的群体。公办教师、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之间存在不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与政府之间、地方社区之间存在不同的互动关系。这些观点和研究在其他著作中尚未深入涉及，具有一定创新性。

但是，该书仍然有一些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首先，作为一部乡村教师发展史研究，史料收集仍然存在不足，历史文献考证欠缺，需要进一步充实；该书存在资料堆积现象，需要进一步挖掘乡村教师社会变迁的学理机制。另外，需要进一步关注当前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并通过调查提出具体改进措施。

杨启亮

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序	杨启亮 (1)
导言	(1)
一 选题缘由	(1)
二 文献研究综述	(4)
(一) 乡村教师研究的义务教育视角	(4)
(二) 乡村教师研究的教育学视角	(5)
(三) 乡村教师研究的历史视角	(7)
(四)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及其在乡村社会中的运用	(9)
三 主要观点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11)
四 课题的框架结构与研究方法	(14)
(一) 框架结构	(14)
(二) 研究阶段与方法	(16)
第一章 扎根于乡野的文化人	
——塾师与乡土社会的融通	(17)
一 私塾——中国古代基础教育的主要载体	(17)
二 乡间私塾的文化霸主地位	(20)
三 塾师的乡土文化本位	(22)
第二章 教育转型与角色转换	
——塾师的近代转型	(26)
一 从“华夷”文化辩走向民族—国家构建	(26)

2 “乡野”与“庙堂”之间

二	从沿海到内地——近代新式教育强国梦想	(29)
三	新式教育乡村社会认同危机	(32)
(一)	新式学堂音乐、体育等课程激起的不同反响	(32)
(二)	新式学堂在乡村设置困境	(34)
(三)	“毁学”——弱者的武器	(37)
四	近代教育转型乡村塾师：以王锡彤和刘大鹏为考察中心	… (40)
(一)	从乡村塾师走向近代实业家——王锡彤	(41)
(二)	乡村塾师刘大鹏的教育生活	(48)
五	近代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	(58)

第三章 乡村教师文化群体之间的竞争

——私塾与“洋学”的冲突	(62)	
一	新式学堂在与私塾竞争中落败	(62)
二	乡村新式教师与塾师竞争	(65)
(一)	乡村新式教师面临多重困境	(66)
(二)	新式教师形象滑落	(69)
三	教育小说中乡村教师——倪焕之心理世界	(74)

第四章 “向着农民烧心香”

——近代乡村教育运动与乡村教师社会功能重构	… (79)	
一	近代以来乡村社会文化权力的变化	(79)
(一)	传统文化重心在农村	(80)
(二)	绅士城市化	(82)
(三)	乡村权力结构蜕化	(83)
二	费孝通、梁漱溟与杜赞奇关于近代乡村社会结构理论	… (84)
(一)	差序格局与绅权模型	(84)
(二)	伦理本位的乡村社会结构	(85)
(三)	经纪模型	(87)
三	乡村教育危机与乡村教育运动	… (88)
(一)	民国乡村教育危机	(89)
(二)	乡村教育运动	(92)

四 乡村教育师范与乡村教师重塑	(97)
(一)“师范下乡”	(98)
(二)乡村教师社会功能	(102)
 第五章 政治动员时代乡村教师职业理想	(105)
一 国家改造与乡村政治运动	(105)
二 园丁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民教师形象重塑	(107)
三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教师的 价值定位	(110)
四 政治动员时代乡村教师扩充	(113)
 第六章 公办教师、民办教师、代课教师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教师身份比较分析	(117)
一 公办教师——国家干部编制的教师	(117)
(一)公办教师的干部编制	(118)
(二)公办教师的婚姻	(119)
二 民办教师——消逝的教师群体	(119)
三 乡村代课教师——游离于国家教育体制边缘的人	(125)
四 农村特岗教师——新兴的农村教师群体	(132)
(一)“特岗计划”——破解农村师资难题	(132)
(二)农村“特岗教师”政策实施存在的问题	(133)
(三)深化农村“特岗教师”政策之建议	(137)
五 教师身份的国家建构与乡村生活疏离	(139)
六 异化的乡村教师与地方政府关系	(142)
(一)乡村学校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	(142)
(二)乡村教师与地方政府异化关系	(144)
七 “文字上移”与乡村教师的社区教育功能	(147)
 第七章 乡土文化与乡村教师公共性	(149)
一 乡村文化与农民生存伦理	(149)
(一)乡土文化的现实境遇	(150)

4 “乡野”与“庙堂”之间	
(二)农民生存伦理	(152)
二 乡村教育公平与城乡教育文化再生产差异	(154)
(一)乡村教育公平:从道德关怀到制度正义	(154)
(二)教材中城乡文化再生产差异	(155)
三 农村信息技术教师生存状态——城乡信息文化	
失衡的表征	(162)
(一)问题的提出	(162)
(二)研究设计	(163)
(三)成因	(166)
(四)结论与建议	(168)
四 当前乡村教师疏远农村生活的文化困境	(171)
(一)村落生活的“异乡人”	(171)
(二)乡土文化的“陌路人”	(172)
(三)村落事务的“边缘人”	(173)
(四)乡村教师陷入专业主义误区	(173)
五 农村教师教育“去农化”及地方高师师范性弱化	(176)
(一)农村教师“专业化”现状	(176)
(二)地方高师农村教师教育优势衰退	(181)
(三)强化地方高师的为农性	(183)
六 公共性回归——促进农村教师融入乡村生活	(186)
(一)凸显农村教师之新农村的文化引领	(186)
(二)重塑乡村教师的道统符号意义	(189)
结语	(191)
一 现代教育在农村推行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191)
二 国家力量在场和乡村教师社会功能的弱化	(193)
三 重构乡村教师与村落社区、国家的互动关系	(196)
参考文献	(199)

导　　言

一　选题缘由

近年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令国人振奋。当前国内学界及政策部门偏重从技术、策略层面讨论新农村建设，却忽视了教育尤其是乡村教师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所扮演着重要角色。事实上，建设新农村最缺乏的是知识和智力资源，而社会上其他知识力量又难以通向农村，这一直是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瓶颈”。因而，乡村教师是建设新农村建设必须依靠的知识力量。但是作为深处我国农村的知识分子群体，乡村教师一直与农村经济社会缺乏应有的互动。这不仅是我国农村教育资源的浪费，而且是我国农村主要文化资源的巨大浪费。

选择乡村教师作为研究“三农”问题和农村教育的主要突破口，从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去探索乡村社区、地方政府与教师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教师身份的国家建构与乡土生活的冲突与矛盾。通过教师个人的生活叙事，从而将宏大的历史变迁置于鲜活的生命场景中去，展示乡村社会、文化与国家力量冲突与竞争的生动场面，使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乡村教师在新农村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存在的缺陷。

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是理解 20 世纪乡村教育变迁的重要参照系。研究乡村教师角色的演变必须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去考察。韦伯在论述中国传统社会组成和权力结构的时候认为，村落是一种离旧政府的功能甚遥远的自治单位。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主要由

2 “乡野”与“庙堂”之间

“同意权力”和“教化权力”组成，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所生产的，不足以提供横暴型政治所需要的大量资源，因此封建帝王通常采用“无为而治”来平天下，让乡土社会自己用社区的契约和教化进行社会平衡，从而造成农村社会“长老统治”局面。^①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折射出封建帝制时代的乡村与国家权力关系的松散性，乡村社会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皇权止于县政”、“天高皇帝远”，说明了乡村社会在自身固有逻辑轨道上运转，介于官与民之间的绅士群体维系着乡村无为而治，私塾则由家族或家庭承担，在这种框架下，乡村教育处于自治状态。

应该看到传统中国，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是疏远的，农民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是由乡里社会自身的运行逻辑所决定，国家与社会呈现分离的状态。但是清末新政以来，国家政权逐步向乡村下沉，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延伸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联系。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考察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中，认为民族—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和持续不断的现代化努力加强了对社会全方位的监视和改造，与此相应，“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美国女史学家芮玛丽（Mary C. Wright）将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归结为民族主义的勃兴，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最强大的动力。

20 世纪以来，政府对基层社会进行逐步改造，试图在新的基层政权基础上对社会—文化的变迁做出统一规划。这集中体现在国家努力改造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经济基础、干预地方财政制度、以“新学”取代传统社区文化。政府推行国民“新教育”是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渗透和改造传统社区文化的重要手段。研究 20 世纪乡村教师角色演变必须将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宏观参照系，近代以来，国家力量不断向乡村渗透，乡村中的新式学校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它替代了传统血缘关系的宗族设学，代表了国家组织向地方社会的延伸。乡

^① “同意权力”指在社会中经由默认、契约、退让而形成的力量；“教化权力”指通过文化的传承和传统的限制所造成的力量和社会支配。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村国民学校的成立是国家权力渗入乡村社区的重要标志。现代教育体制取代了传统的社区训练，使注重标准化知识的新型“雅文化”侵入乡村社区，排挤传统社区文化。乡村新式教育与地方社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传统乡土社会，人的社会再生产是社区性的面对面式的人际关系训练，到了民族—国家时代，全民教育和普遍性知识成长起来，并取代了社区性的社会再生产方式。与此相应，政府不断加强对乡村新式教育的管理，现代意义上的教师和课程体系正在纳入国家的规划之中，流落乡野的乡村塾师面临着改良、检定、整顿的困局，教师与国家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独立的师范体系开始形成，乡村教师逐渐脱离地方社区之外，成为一种特殊的群体。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标志着国家权力开始进入乡村教育，乡村教师身份的国家化与国家政权的下沉是一致的。乡村教师摆脱乡土滋养进入国家体制内，从“乡土”走向“庙堂”，却逐渐疏远乡土社会，与村民生活的隔膜愈深。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高度渗透乡村社区，单个的村落和家庭开始直接面对国家政权的力量，乡村社区与国家的关系从传统时代的相对独立，到一个世纪以来行政力量全面渗入，村落演变成为国家监视体系的“细胞”。与此相应，政府加强了对乡村教育的控制与管理，作为一种职业，乡村教师首先被政府从乡土社会空间中隔离开来，如禁止教师改行、调动工作、对教师职业形象的定型以及鼓励教师终身从教等政策，使教师职业表现出稳定性、隔离性，成为一个独特的受政府控制的社会阶层。乡村教师作为地方社会最广大的知识群体，蜕变为单纯“教书匠”或“孩子王”的角色，缺乏与乡村经济社会更广泛的互动与联系；乡村教师在拥有国家体制内关怀的同时，却逐渐失去了与乡土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成为乡村社区生活的“边缘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政府不断提高乡村教师的学历层次，追加乡村教师的工薪报酬，积极创造条件使乡村教师参加到地方社区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去，使乡村教师“活”在乡村，“活”在农民之中，而不是服务于“上”与服务于“外”，让乡村教师成为乡村社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脱离“乡土”身份，成为一个单纯的“公家人”。

二 文献研究综述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将文化区分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大传统是指代表着文献文化的上层知识社会的文化取向；小传统主要指民间社会自身所创造的文化。乡村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村落中教育的小传统往往游离于主流研究话语之外。应该看到大传统式的乡村教育研究固然有其自身价值，但是难以摆脱单线进化论相对空泛的弊端，让人无法触摸到乡土社会的真实性，这样乡土社会的真实教育图景往往淹没在政府宏大的主流话语中去，政府的教育改革离乡村教育的真实需求也越来越远。

近年来，乡村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是既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从国家教育政策或政府的宏观规划出发，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分析乡村教师发展现状及其问题，忽视从乡民的教育需求、乡村文化变迁来研究乡村教师，忽视从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中考察乡村教师角色演变、功能及其存在的缺陷。

（一）乡村教师研究的义务教育视角

王嘉毅的《农村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困难与对策》详细地分析了农村中小学教师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从新课改的背景下提出提高农村中小学素质教育的若干对策；袁桂林的《农村中小学教师问题浅议》一文认为，在义务教育经费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问题是关键，也是难点。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师数量呈现出结构短缺；第二，教师队伍整体质量不高。论文从制度重建角度思考解决农村中小学教师问题。王嘉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农村教师现状及改善策略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城乡教师素质差距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在农村贫困地区，学校信息闭塞、硬软件缺乏、管理不够、师生素质较低，课题就如何全面提升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适应新课程改革，并自觉实现“现代教师”角色转换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田慧生的《关于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的思考》，从义务教育政策视角分

析农村中小学教师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对对策；新三片地区基础教育水平研究课题组关注到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拖欠，代课教师问题以及“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落实情况，并对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社会地位提供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中国与加拿大“增强乡村教师能力培训”项目团队的教育工作者们开发的《乡村教师能力提高手册》一书，设计能力本位教育、儿童早期教育理论、评估策略、教师协助组等主题模块，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学校教育和实地培训，增强乡村教师的工作能力；周军的博士论文《乡村教师文化生态及乡村教育变革》，从文化生态视角探讨了乡村教师发展与乡村教育变革的关系。此外，唐松林主持的“小康视野中农村教师发展研究”课题；文东茅的《义务教育师资配置均衡化的政策选择》；孙学忠的《农村教师工资拖欠情况调查与思考》；于向东、胡宝生、赵光千主编的《农村教师素质提升丛书》；祁晓玲、刘世民主编的《四川农村教师生存状态调查及分析》；窦永庆、刘新昌的《苦啊，贫困地区的农村教师》；池文的《教师苦累的背后》；等等。这些研究直观地描述了农村教师发展的数量、质量、结构、效益、生活待遇与生存环境问题，对农村学校中的代课教师、民转公教师等群体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大多数关于乡村教师的研究仍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以及生存状态的同情，只看到乡村教师现状的艰难性，对乡村教师发展问题的症结、原因及其影响因素缺乏深刻分析，更忽略了将乡村教师角色的演变与地方社区、国家权力的互动联系起来，从复杂社会历史文化背景^①中去探讨教师身份的国家建构与乡村生活的矛盾与冲突。

（二）乡村教师研究的教育学视角

我国的教师研究具有以下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教师领域”

^① 一所偏远的学校，因学校条件差，一年就走掉8位教师。乡里实在派不来教师，只好请了一位刚毕业等待分配的女大学生来代课。当女大学生接到分配通知，含泪告别淳朴的山民走下山坡时，几十个孩子齐刷刷地跪在高高的山坡上！女大学生重新把行李扛回小学校，一干就是几十年，终于积劳成疾……曾经感动无数人的影片《凤凰琴》真实再现了几年前农村教师的艰难处境。

6 “乡野”与“庙堂”之间

研究主题集中在教师职业的重要性以及教师职业修养等课题上；80年代后期，关注的主题转移到教师劳动的特殊性、教师职业的地位与教师报酬方面；90年代后期，研究的主要焦点为教师职业的工资待遇、职业威信、职业成就等方面。^①但是已有的对教师研究的成果多停留在应然层面，追求应当“是什么”、“如何做”，表达对教师政策的诠释，缺少将教师置于特定的权力场域，放于更宽泛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中去探讨教师的成长史。近年来，一些研究成果开始将权力实践引进教师领域，胡金平的博士论文《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角色困顿——大学教师的社会学研究》、刘云杉博士后出站报告《从启蒙者到专业人：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教师角色演变》，从社会学的视域探讨了国家、社会和学校互动关系中教师角色演变中的冲突和困惑，揭示教师复杂的生存状态。

当前教育学界对教师发展研究的理论成果相当丰富，叶澜等著《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将研究重点不是放在“育人”这一通常被人关注的教师研究的热门主题上，而是放在教师如何“育己”这一通常被人忽视，然而却是对教育质量、教师生命质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上，进而探究教师角色新形象，重建教师职业角色生命内涵。周南照等主编《教师教育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是关于教师发展研究的论文集，收录的绝大部分论文、报告选自“国际教师教育论坛”，从国际比较视野探讨了教师教育改革的最新进展，同时介绍了我国教师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些重大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傅建明的《教师专业发展——途径与方法》探讨了教师专业发展之路，包括基于“教历”的教师发展、基于“研究”的教师发展、基于“教学合作”的教师发展、基于“自主”的教师发展、基于“反思”的教师发展、基于“同伴互助”的教师发展、基于“专业引领”的教师发展。申继亮的《新世纪教师角色重塑：教师发展之本》分析了教师知识的内涵及培养；阐述了教师所需具备的人际交往、课堂管理、教育研究和教学监控四种能力；并围绕教师的职业动力，探讨了教师的职业承诺与组织承诺、工作积极性、教学归因等问题。Kathleen M. Bailey（贝利）、Andy Curtis（安迪·

^① 刘云杉：《从启蒙者到专业人：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教师角色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